

从策略传授到观念重构： 孤独症儿童家长执行式干预个案研究*

左秋芳，潘煜静

(豫章师范学院 特殊教育学院，江西 南昌 330103)

【摘要】以 3 个孤独症儿童家庭为对象，采用跨被试多基线设计，探索以“观念重构”为基础，以“积累儿童与人互动的积极体验”为目标的家长执行式干预的成效。通过 1 天线下理念培训与 7 周线上互动视频反馈指导，重点引导家长将视角由“问题矫正”转向“积极发展”，重塑家长的孤独症儿童观与亲子互动观，注重儿童在与人互动中的愉悦体验而非技能训练。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母亲在互动中的积极情绪与同步行为显著增加，儿童主动眼神对视频率提升，亲子凝聚力增强，且干预效果在干预结束 1 个月后仍得以维持。研究表明，家长执行式干预的重点从“传授家长策略”转向“重构家长观念”，能有效积累儿童“与人互动的积极体验”，有效改善亲子互动质量，激发儿童的社交意愿，可为以家庭为中心的孤独症早期干预提供具有本土实践价值的新范式。

【关键词】孤独症儿童；积极体验；家长执行干预；亲子互动

【中图分类号】G7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 (2025) 05-0120-13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5.05.013

一、引言

孤独症谱系障碍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既往亦常称为“自闭症”) 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其核心临床表现为社会交往缺陷以及受限、重复的行为模式与兴趣活动。近年来，全球范围内 ASD 患病率呈上升趋势，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2022 年的调研结果显示其患病率达 3.2%。^①2020 年，由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牵头的一项全国多中心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 6~12 岁儿童 ASD 患病率为 0.70%，男女比例为 3.17:1。^②据此推算，我国现有 ASD 患者约 987 万，其中 0~12 岁儿童约为 150 万。目前 ASD 病因尚未明确，亦缺乏特效药物治疗，因此早期干预成为改善其预后的关键措施。

从国际整体发展趋势来看，以家庭为中心的实践正逐步取代以儿童为中心的实践，成为特殊儿童早期干预的最佳实践。^③以美国为例，其 1997 年颁布的《残疾人教育法修正案》中便提到，早期干预的重点之一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数据显示，1996 年美国有 56% 的 0~2 岁残障婴儿和学步儿在家中接受早期干预服务，2001 年这一比例上升至 77.6%，到 2006 年则为 85.5%。^④

当前，我国 ASD 儿童早期干预仍以康复机构为主，但随着对机构的干预模式局限性的反思及对家庭中心模式认识的深化，家庭中心实践在国内也逐渐受到重视。相关学术成果逐年增多，2024 年中国残联

* 【作者简介】左秋芳，女，江西吉安人，豫章师范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孤独症儿童教育；潘煜静，女，江西景德镇人，豫章师范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特殊教育与融合教育。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从自闭到自闭症的阻断机制研究”(20JY33)。

① Prevalence and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mong Children Aged 4 and 8 Years –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Monitoring Network, 16 Sites, United States, 2022 [EB/OL]. (2025-04-17) [2025-09-10]. <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74/ss/ss7402a1.htm>.

② ZHOU Hao, XU Xiu, YAN Weili, et al. Prevalence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in China: a nationwide multi-center population-based study among children aged 6 to 12 years [J] Neuroscience Bulletin, 2020, (36): 961-971.

③ 申仁洪. 家庭本位实践：特殊儿童早期干预的最佳实践 [J]. 学前教育研究, 2017, (9): 14-24.

④ 石丽娜，王小英，刘秒杞. 美国联邦政府残障儿童早期干预政策的发展及启示 [J]. 学前教育研究, 2013, (12): 3-10.

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孤独症儿童关爱促进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8年)》更明确将“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早期干预服务”列为重点任务。^①

家庭中心早期干预的核心在于通过提升家长及家庭成员的专业能力,在专业人员支持下使其具备独立制定并执行教育决策的能力,使得专业人员撤销对家庭的介入后家长能够独立运用所学技能处理儿童相关问题。^②该模式在实践中常通过家长执行式干预(Parent-Implemented Intervention, PII)或父母介导式干预(Parent-mediated Intervention, PMI)实施。2014年,美国国家孤独症专业发展中心已将PII列为27种循证实践之一。^③PII通常包括家长培训与家长实施干预两个环节,培训方式涵盖讲解示范、角色扮演、录像分析等,内容涉及亲子互动、行为管理、社交技能提升等多类策略。例如,Mahoney与MacDonald提出的反应性教学(Responsive Teaching, RT)课程,是通过教导家长采用跟随儿童引导、建立共同注意、一致性回应等策略,增强其对儿童行为的反应性,进而促进儿童语言、认知、社会情绪等多方面发展的一种家长培训课程。^④再如亲子互动治疗(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herapy, PCIT),该课程分为儿童主导的互动(Child-Directed Interaction, CDI)和父母主导的互动(Parent-Directed Interaction, PDI)两个阶段,前者强调通过行为描述、反思性评论等方式建立良好亲子关系,后者则侧重于指令发布与行为管理技能的培养。^⑤

国内PII实践多借鉴国外模式,即由专业人员向家长传授策略,再由家长在家庭环境中落实。例如,刘昊通过现场指导父母掌握共同注意干预策略,进而由家长居家对儿童实施干预^⑥;黎和敏通过训练母亲的沟通能力,有效改善了儿童的攻击行为并增进了亲子互动^⑦;左秋芳通过指导家长运用选择策略,提升了儿童在作业情境中的参与度^⑧。张雅茹等的研究则进一步表明,家长在执行干预过程中若获得专业人员的持续督导,其对儿童核心症状的改善效果会更为显著。^⑨

然而,PII模式在干预逻辑及实践效果上逐渐凸显出局限性。其一,培训内容侧重于具体策略,干预目标集中于儿童技能提升或行为改善,忽视家长观念转变与互动中的情感体验。例如,郝丹诗等综述的14篇研究均以儿童语言、社交等能力发展为干预有效性的评估指标,仅4项涉及家长层面的评估^⑩;林欢喜等分析的19篇文献中,仅5篇关注父母压力变化^⑪;潘日宇等针对37项研究的Meta分析发现,所纳入分析的研究均以儿童社会沟通、问题行为改善等为核心干预指标^⑫。其二,干预过程由专业人员主导,强

① 孤独症儿童关爱促进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8年)[EB/OL]. (2024-07-21)[2025-08-15]. <https://www.cd-pf.org.cn/zwgk/zcwj/wjfb/e9e23982df5248e3b0d82d180c368996.htm>.

② 朱晓晨. 发展迟缓儿童社会技能的家长执行干预案例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③ 曾松添,胡晓毅. 美国自闭症幼儿家长执行式干预法研究综述[J]. 中国特殊教育,2015,(6):62-70.

④ KONG N, et al. Responsive interaction interventions for children with or at risk for developmental delays: a research synthesis[J]. Topics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2011, (1) 4-17.

⑤ AGAZZIH, TANR, TANSY. A case study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J]. Clinical Case Studies, 2012, (6): 428-442.

⑥ 刘昊,刘立辉. 父母实施孤独症儿童共同注意干预的效果研究[J]. 中国特殊教育,2010,(2):36-41.

⑦ 黎和敏,倪萍萍,咎飞. 基于攻击行为功能的学前儿童家长执行干预的个案研究[J]. 中国特殊教育,2017,(4):72-78+96.

⑧ 左秋芳,肖非,邓云梅. 使用选择策略改善自闭症儿童行为表现的个案研究[J]. 中国特殊教育,2015,(7):27-33.

⑨ 张雅如,陶洪梅,阳光,等. 专业人员指导下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家长执行的家庭康复疗效观察的前瞻性研究[J].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2021,(12):1256-1261.

⑩ 郝丹诗,刘姝,秦阳阳,等. 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家庭早期干预研究的范围综述[J].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25,(3):313-318.

⑪ 林欢喜,刘潘婷,童梅玲,等. 父母介导的干预在孤独症谱系障碍治疗中应用效果的Meta分析[J].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23,(3):304-310.

⑫ 潘日余,王翠艳,刘文丽. 父母介入学龄前孤独症儿童早期干预效果的Meta分析[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5,(4):66-78.

调家长执行的“忠实度”或“依从性”，亲子互动被工具化，家长的自主决策权被忽视。正如刘潇雨指出，传统服务视角多从干预者本位出发，服务理念深受“医学视角”的影响，需求关注点在于提高家长的康复知识和技能，在家庭环境中进一步减轻儿童症状，实质上是以“修正”儿童问题为本的服务设计，家长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修正”儿童症状的重要工具。由于服务模式强调对于儿童“症状”的消除，服务过程中注重知识和经验单向的“施”与“受”的关系，强化教育效果的同时，忽略了家长在服务过程中的自我反思能力和能动性，忽略了家长对亲职意义和信念的探索。^① 上述局限与家庭本位干预所倡导的赋权增能核心理念存在矛盾^②。

因此，家庭中心早期干预亟须实现从“策略传授”到“观念重构”的范式转变。具体而言，应引导家长从“问题视角”转向“积极视角”，在互动中重视情感联结与积极体验的积累，将儿童技能发展视为高质量互动的自然结果；专业人员应与家长建立平等协作关系，支持其成为干预的主动反思者与决策者。基于上述构想，本研究融合家庭生态系统理论、积极心理学与依恋理论，开发了以“观念重构”为基础、以“与人互动的积极体验积累”为目标的家长执行式干预课程，并开展实证研究，旨在检验课程对家长观念转变的促进作用，验证“与人互动的积极体验积累”对儿童社交行为与意愿的影响，探索观念-行为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为家庭中心早期干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范式。研究假设为：以观念重构为核心的家长培训可促使家长以更积极的状态投入互动，从而增强儿童在互动中的积极体验，激发其社交意愿，提升亲子凝聚力。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实证研究部分主要运用个案研究中的单一被试法，采用跨被试多基线设计，以验证开发的家长执行式干预课程在重塑家长观念，提高亲子互动质量中的有效性。

(一) 研究对象

1. 研究对象的招募过程

通过某儿童康复中心发布的《孤独症家长公益课堂通知》，对报名的家长开展为期 1 天的免费线下理论培训，最终选定通过线下理论培训考核并自愿签署研究知情同意书的个案 X、个案 W 和个案 H 的家庭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研究不收取任何费用。

2.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个案 X：男，独生子女，2 岁确诊孤独症，加入本研究时 2 岁 2 个月。X 大量时间沉迷于“旋转物品”，几乎“万物皆可转”，只会在有需求时会用手去拉大人，偶尔会发出“妈妈”“崽崽的”等叠词。其家庭经济状况良好，日常养育精细，要求高、规则多，如家里所有柜子均上锁，以防止孩子捣乱或发生安全问题。确诊后不久，X 在某康复机构接受了 1 个月的社交及言语训练，但因 X 消极情绪爆发的频率及程度均明显加强，父母转而尝试居家干预。

个案 W：男，2 岁 5 个月确诊为孤独症，有个 8 岁的哥哥。W 几乎没有口语表达和明显的情绪表达，日常发起的活动不多，简单需求如用餐、如厕等大多能自己解决。其家庭经济条件较为普通，但家庭氛围比较融洽，日常养育倾向于让 W “自然成长”，给予其单独的陪伴及互动较少。确诊后，父母的陪伴意识有所增强。

个案 H：男，1 岁 10 个月确诊为孤独症，加入本研究时为 2 岁 4 个月，有个 10 岁的姐姐。H 几乎没有口语表达，日常发起的活动也不多，少有明显的情绪表达。其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在关于 H 的问题上，该父母的教育观念极不相同，父亲将孩子发展的滞后归咎于母亲照顾不周。H 家的家庭氛围淡漠，父亲从未参加过研究期间的线上会议，平常也极少与孩子互动。

以上 3 个家庭的最大诉求均为掌握科学的干预理念及方法，提升亲子互动质量，帮助孩子减少沉迷状

① 刘潇雨. 中国自闭症儿童家长教育服务模式探析：对现有模式的反思和再探索 [J]. 中国特殊教育, 2016, (1): 36-41.

② 申仁洪. 家庭本位实践：特殊儿童早期干预的最佳实践 [J]. 学前教育研究, 2017, (9): 14-24.

行为,增强人际互动能力。

(二) 家长执行式干预课程

本研究通过对已有家长执行式干预课程进行梳理和反思,在家庭生态系统理论、积极心理学与依恋理论的指导下,开发了以“观念重构”为基础,以“与人互动的积极体验积累”为目标的家长执行式干预课程。课程的核心目的在于重构家长的孤独症儿童观与亲子互动观。课程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1. 阶段一:线下理论课程

线下理论课程的目的:一是进行研究对象的招募与筛选,完成课程并通过现场考核的家长,被视为后续实证研究的潜在合作对象;二是为后续开展的线上实践指导奠定认知基础,确保家长对干预的核心理念有初步的理解与认同。

线下理论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递进的3个模块。一是反思传统干预范式:通过理论讲解、视频分析及研讨,揭示“工具化互动”的局限性。例如,通过呈现“使用零食作为强化物以诱导儿童开口说话”等常见干预场景,引导家长反思此类做法虽在当下可能成功诱导儿童出现目标行为(即开口说话),但儿童互动的目的是获取物品而非与人交流,很难真正构建儿童与人互动的动机,甚至某些做法(如故意移走儿童正在玩的玩具,以引发儿童用口语提要求的行为)还可能成为其对人际互动的消极体验。二是重新理解孤独症儿童:引导家长认识到,孤独症儿童异常的社交表现核心源于其“社会属性”的缺失。人的社会属性并非先天具备,而是在积极参与人类社会活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的。因此,干预的首要重点不应是机械地“练技能”,而是让其感受到“跟人玩很好玩”,积累与人互动的积极体验,从而愿意主动发现人、指向人,构建其参与社会人类活动的内在动机。三是确立亲子互动的核心目的与原则:明确亲子互动的直接目的是为儿童积累积极的与人互动的体验,在互动中,家长应以赏识、尊重的心态,运用活泼、逗乐的方式,确保“让儿童感觉与人互动是愉悦的”这一目标优先于任何具体的技能训练目标。

课程结束后,通过设置日常互动情境(如“当孩子沉迷于旋转物品时,你会怎么做?”)对家长进行考核,以评估其对核心理念的领悟与认同程度。

2. 阶段二:线上亲子互动实践指导

线上指导的目的是通过分析家长每周提交的亲子互动视频,持续巩固线下课程所传授的理念,并提供落实理念的具体策略。线上指导内容具有生成性,均源于视频中的“共性闪光点”(符合核心互动原则的操作)或“共性卡点”(如出现大量指令等违背原则的操作)。

线上指导前的准备工作包括:研究者完整地观看互动视频,分析并记录其中的“闪光点”与“卡点”;同时,引导家长完成当周亲子互动的自评与反思,帮助其建立“旁观者视角”。

线上指导分为3个步骤。一是倾听:邀请家长分享当周“与孩子玩得最开心或最困惑”片段的个人分析与感受。二是反馈:结合“闪光点”,肯定和欣赏家长为调整互动所付出的努力及取得的成效;针对“卡点”,首先与家长进行情绪共鸣(如“能理解您当时是希望孩子尽快回应”),继而通过反思性提问(如“您觉得当您这样做时,孩子会是怎样的感受?”)、理念点拨(如“请牢记,互动的核心目的是让孩子获得与人互动的积极体验”)及提供具体的改进示范与建议,对家长进行指导。指导内容聚焦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减少削弱互动趣味及互动品质的行为,包括过多旁白式及描述性语言,过多提问式及指令式语言,矫正式或教学式的互动行为等;另一方面是增加提升互动趣味及互动品质的行为,如使用夸张的表情、动作,以及富有感染力的语音、语调逗乐孩子。三是总结:就当周家长在互动中表现出的主要进步、核心问题及改进建议进行总结,再次强化核心理念,并对家长后续的实践给予积极展望。

在线上指导期间,研究者虽然鼓励家长以高涨、活泼的情绪与儿童互动,但是家长可根据自身状态决定互动时长与方式,并被建议在情绪不佳时避免“打扰”孩子,以免给孩子带来消极体验。

(三) 研究情境

研究期间恰逢疫情,因而除研究对象招募时组织的线下理论培训,线上实践指导均通过百度网盘群聊、腾讯会议等线上平台进行。线上指导流程为:第一,家长拍摄日常居家情境如吃饭、游戏等亲子互动视频,视频需在自然状态下采用广角镜头连续拍摄10~15分钟,且能清晰地看到儿童表情及周围环境

的核心信息；第二，家长每周上传 2 段互动视频至百度网盘群聊，并填写亲子互动自评问卷，就互动目的、效果、感受等进行自评和反思；第三，研究者根据视频评估亲子互动情况，制定改进方案。随后召开腾讯会议，反馈亲子互动视频的分析结果，给出改进策略及建议；第四，家长调整亲子互动并录制视频以供下次评估与干预。

(四) 研究程序

1. 基线期

在签署研究知情同意书后，线上实践指导开始前，采集 6 段亲子互动视频用作基线期数据，用以评估指导前的互动行为及质量。因研究者充分理解父母的焦虑情绪，尽早实施指导，基线期时长未以数据稳定为标准，而是在 1 周之内完成数据采集。

2. 干预期

基线视频分析结束后，立即启动线上实践指导。指导前研究者均先分析视频，再召开腾讯会议，每次指导耗时约 1.5~2 小时，每周指导 2 次，共 7 周，指导在当年春节前结束。会后，家长根据指导调整亲子互动状态，录制互动视频并上传以供下次分析。

3. 维持期

线上实践指导结束 1 个月后，即春季开学后的半月内采集 4 段自然状态下的亲子互动视频，并对家长进行回访，用以评估家长习得的亲子互动理念、技巧及亲子互动质量的改善是否得以延续。

(五) 因变量与测量

1. 因变量的操作性定义

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及基线期评估情况，确定以下因变量用以评估干预的效果，如表 1 所示，所有因变量均采用频率记录法。

表 1 因变量及其与研究目的对应关系

因变量	操作性定义	与研究目的对应关系
母子情绪	积极情绪：一切能反映愉悦情绪的表现，如愉悦而放松的表情、温暖或开心的语气、拥抱、亲吻等 消极情绪：紧张、担忧、难过、焦虑、无奈等状态	用以评估干预是否促进家长积极观念的转变，不再将互动视为不得不完成任务
母亲互动行为	非同步互动行为：试图制止儿童当前行为的一切做法，如用手拉住或挡住儿童、拿走儿童玩具、口头制止等，也包括直接告知儿童做什么或如何做的口头及动作指令；与此相对的是，试图支持儿童当前行为的一切做法	用以评估干预是否促进了家长的观念由“问题矫正视角”向“积极发展视角”转变，并进而带动了“互动去工具化”
亲子凝聚力	反映亲子间亲密、互惠和愉悦的一切表现，如身体上的彼此亲近（孩子坐在母亲怀里、母亲亲吻或拥抱孩子）、相互表达喜爱及愉悦（如看着对方笑）等，属于亲密式的亲子关系；与这种状态相对的是，彼此对抗的亲子关系	用以评估致力于儿童与人互动积极体验获得的干预是否能提升儿童对人的亲近感及与人互动的意愿
眼神对视行为	儿童对互动中的母亲发起的主动视线接触及注视行为	用以评估致力于让儿童获得与人互动的积极体验的干预是否能提升儿童互动的意愿

基线期对 3 组家庭的亲子互动评估发现，H 母和 W 母在亲子互动时较少表现出明显的消极情绪，因此 H 和 W 的因变量不包括母子消极情绪。此外，H 母极少会对 H 发出指令或试图制止 H 的某个行为，故 H 的因变量不包括母亲的非同步互动行为。

2. 因变量的编码方案

基线期每对母子均采集了 6 段视频，干预期共采集 14 段视频（每周 2 段），维持期采集了 4 段视频。

所有视频均采用 10 秒全时段观察法进行编码，每段视频从第 2 分钟开始连续编码 5 分钟。由研究者与另一名受过训练的硕士毕业生分别进行独立编码，为了保证编码一致性，研究者随机抽取 3 段视频编码数据用以计算观察者间一致性，计算公式为：观察者间一致性系数 = (2 名编码者编码一致的频数/编码总数) × 100%。各个因变量的编码信度为：亲子凝聚力为 92%，母亲互动情绪为 89%，儿童互动情绪为

90%,眼神对视行为为90%,非同步互动行为为91%。编码完成后,使用WPS软件将编码所得数据绘制成折线图。

3. 数据整理与分析

对编码的量化资料进行趋势分析,同时对互动视频分析、腾讯会议、随机访谈、日常观察记录和亲子互动自评问卷等质性资料进行分析,从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作为编码数据的补充,以多方验证干预效果。

三、研究结果

(一) 亲子互动中的母子情绪:从强打精神到真心愉悦

图1呈现了3个阶段母子情绪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母子情绪从干预期至维持期均有较大的积极转变。其中,母亲积极情绪出现率分别为:X母:0%~30% ($M=8\%$)、0%~97% ($M=56\%$)、100%;W母:43%~96% ($M=76.1\%$)、60%~100% ($M=93.6\%$)、93%~100% ($M=98.3\%$);H母:0%~44.4% ($M=22.4\%$)、22.4%~100% ($M=78.1\%$)、46%~100% ($M=83.4\%$)。儿童积极情绪出现率分别为:X:0%~33% ($M=15\%$)、0%~83% ($M=39\%$)、80%~100% ($M=96\%$);W:0%~23% ($M=12.8\%$)、0%~100% ($M=45.7\%$)、0%~53.3% ($M=18.3\%$);H:0%~30% ($M=16.1\%$)、3.3%~76.7% ($M=33.6\%$)、3.3%~50% ($M=23.3\%$)。X母和X的消极情绪出现率分别为:0%~90% ($M=26\%$)、0%~33% ($M=3\%$)、0%和0%~53% ($M=19\%$)、0%~10% ($M=2.5\%$)和0%。

由此说明,经过干预后3对母子互动时的状态更积极、放松了。

日常观察显示,在干预前,X母在亲子互动中普遍表现出焦虑、无奈和担忧的情绪。她自述:“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很压抑的。经常睡不着觉,睡眠很浅。很难跟他玩下去。”与此同时,W母与H母虽未表现出明显的消极态度,但几乎没有愉悦状态,亲子互动更像是母亲们不得不执行的日常养育任务。干预实施后,3位母亲的情绪状态及互动质量均出现积极转变。X母的消极情绪显著减少,更能以稳定、积极的心态投入互动;W母和H母也表现出更为放松、投入的状态,并开始积极尝试运用高涨的情绪去逗乐孩子。这一转变既源于其自身心态的调整与互动理念的更新,也得益于互动方式改变后所带来的积极反馈。正如X母所反思的:“我现在尽量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专注眼前。当我们放下很多要求和期待,以更轻松的状态去跟孩子互动时,孩子的反馈也会更好。”H母也在回访中表示:“我一开始天天就在那叹气,不晓得自己该干什么,他对我发出的信息没有回应,我就会很烦躁。后来在指导下,尝试用夸张而有趣的表情、动作、声音去逗他,他很开心,他开心我也就开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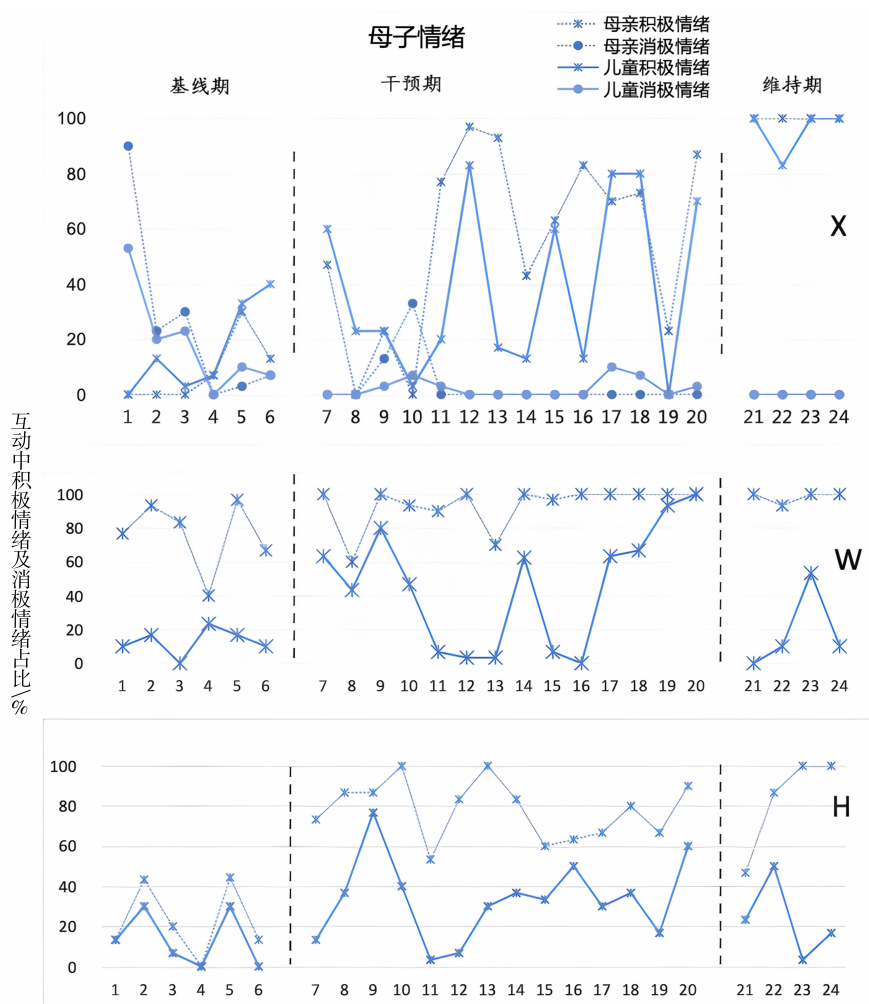


图1 亲子互动中的母子情绪变化趋势

(二) 母亲互动行为：从指令强制到积极逗乐

图 2 显示了 3 个阶段母亲互动行为的变化情况。随着干预的推进，X 母和 W 母的非同步互动行为越来越少，同步互动行为越来越多，这种趋势延续至维持期。其中，X 母的非同步互动行为出现率为：10% ~ 70% ($M = 29\%$)、6% ~ 40% ($M = 17\%$)、5%；同步互动行为出现率为：17% ~ 100% ($M = 73\%$)、81% ~ 100% ($M = 97\%$)、100%。W 母的非同步互动行为出现率为：10% ~ 50% ($M = 30\%$)、0% ~ 43% ($M = 14.8\%$)、10% ~ 26% ($M = 17.5\%$)；同步互动行为出现率为：70% ~ 100% ($M = 89.5\%$)、76% ~ 100% ($M = 95.5\%$)、86% ~ 93% ($M = 91.7\%$)。

视频编码和日常观察均显示，随着干预的推进，X 母在互动中发布指令或强行干预孩子 (X) 的频率越来越低，转而更多地运用温暖的拥抱去抚慰孩子，充满喜悦的目光注视，以及对孩子行为的积极赞赏等方式，主动为孩子营造愉悦的互动体验。W 母在基线期虽极少强势介入孩子 (W)，但仍经常使用简单指令，随着干预的深入，其指令性语言也明显减少。这一转变一方面源于 W 母意识到简单指令对孩子 (W) 来说基本无效；另一方面，W 母通过习得用夸张、愉悦的表情、动作、语气等方法去逗乐孩子，反而能让孩子更好地对自身信息产生回应，自然就不需要依赖指令了。

(三) 儿童眼神对视行为：互动趣味推动主动对视

图 3 显示了 3 个阶段儿童眼神对视行为的变化趋势。经过干预后，3 个个案眼神对视行为均有增加。X 眼神对视行为的出现率分别为：0% ~ 60% ($M = 23\%$)、17% ~ 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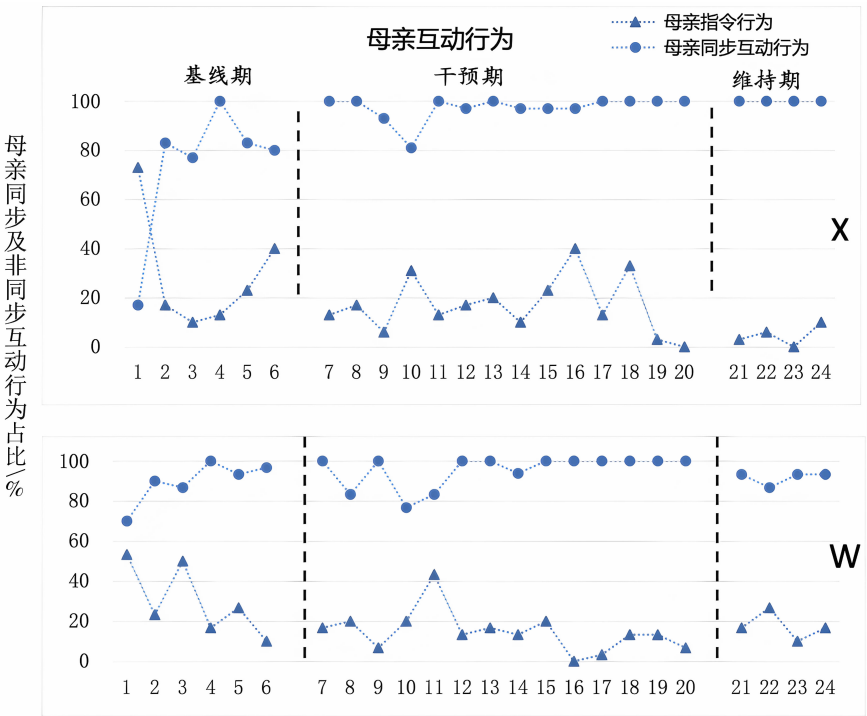


图 2 母亲互动行为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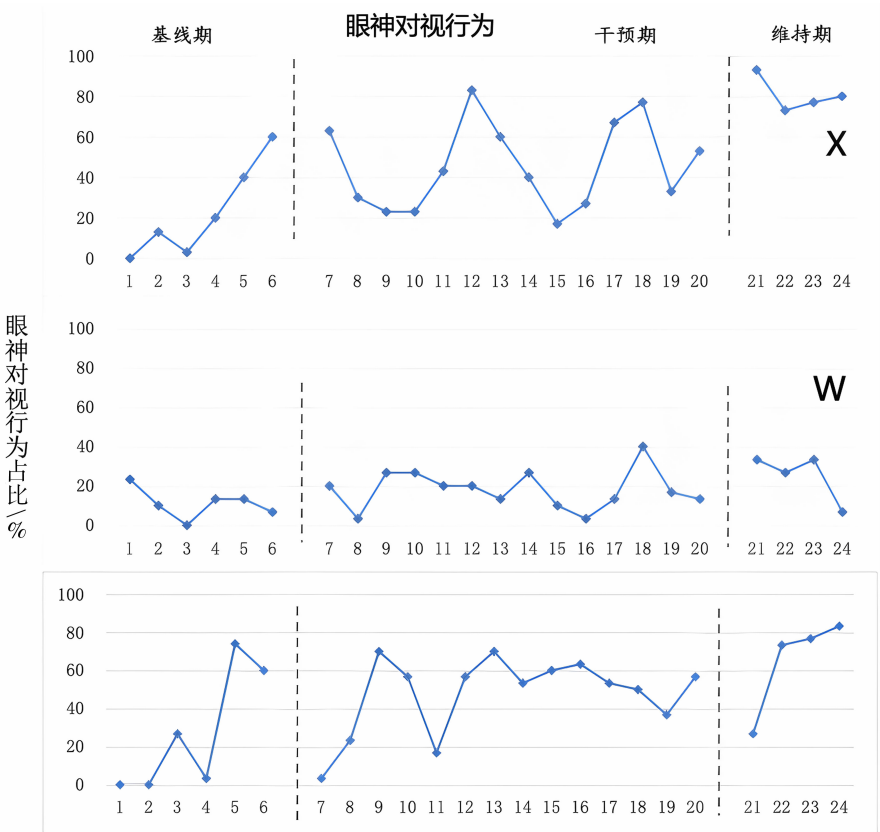


图 3 儿童眼神对视行为变化趋势

($M=46\%$)、 $73\% \sim 93\%$ ($M=80.8\%$);W 为: $0\% \sim 23.3\%$ ($M=11.1\%$)、 $3.3\% \sim 26\%$ ($M=18.1\%$)、 $6.7\% \sim 33\%$ ($M=25.0\%$);H 为: $0\% \sim 30\%$ ($M=15.6\%$)和 $3.3\% \sim 93\%$ ($M=48.8\%$)、 $13\% \sim 56\%$ ($M=25.9\%$)。

观察及访谈均表明,母亲们持续调整互动情绪和互动方式后,儿童的互动兴趣得到极大提高,与母亲有更多的视线接触和身体亲近。X 父亲在访谈中说道:“现在孩子(X)对人的关注比以前好多了,对我们的信任度和亲密度都提高了,更易逗乐他并教他东西。(他)眼神里明显感觉有东西了,会拿着感兴趣的东​​西到跟前来,眼睛仿佛在说‘这是什么?’这种频率很高;(他还)会故意做一些动作来引起大人的反应。”H 母亲也在访谈中表示:“刚开始外出时,H 只要看到楼梯就疯狂地沉迷于上下楼梯的活动,必须生拉硬拽才能将他带走,现在只要说一下‘走了’,他马上就可以跟着走,(我们)说的话好像有用,他听进去了,我觉得他变化挺大,对人的关注有提高。”

3 名个案对互动兴趣和对人关注度的提高,主要原因是母亲在互动中频繁表现出的高涨情绪增加了互动的趣味性,母亲夸张、有趣、出人意料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等使互动过程更松弛、有趣,更易于让儿童感觉自己被喜爱、被赏识,使其主动注视和亲近母亲的意愿也更强烈。

(四) 亲子凝聚力:从对抗到亲密联结

图 4 呈现了 3 个阶段亲子凝聚力的变化趋势,由于 X 母子在基线期常常出现关系紧张状态,因此,研究者特意编码记录了母子间处于明显对抗关系的数据。3 组家庭亲密式亲子关系出现率分别为:X 母子: $0\% \sim 67\%$ ($M=21\%$)、 $0\% \sim 100\%$ ($M=68\%$)、 $83\% \sim 100\%$ ($M=95.8\%$);W 母子: $4\% \sim 83.3\%$ ($M=52.9\%$)、 $73\% \sim 100\%$ ($M=88.6\%$)、 $66\% \sim 100\%$ ($M=83.3\%$);H 母子: $0\% \sim 22.2\%$ ($M=7.6\%$)、 $6.7\% \sim 73.3\%$ ($M=25\%$)、 $16.7\% \sim 53.3\%$ ($M=37.0\%$)。X 母子对抗式亲子关系出现率分别为: $0\% \sim 83\%$ ($M=22\%$)、 $0\% \sim 20\%$ ($M=2\%$)、 0% 。由此说明通过干预,3 对母子的亲子凝聚力均得到了有效提升,亲子关系更加亲密。X 从第 3 次干预开始,与母亲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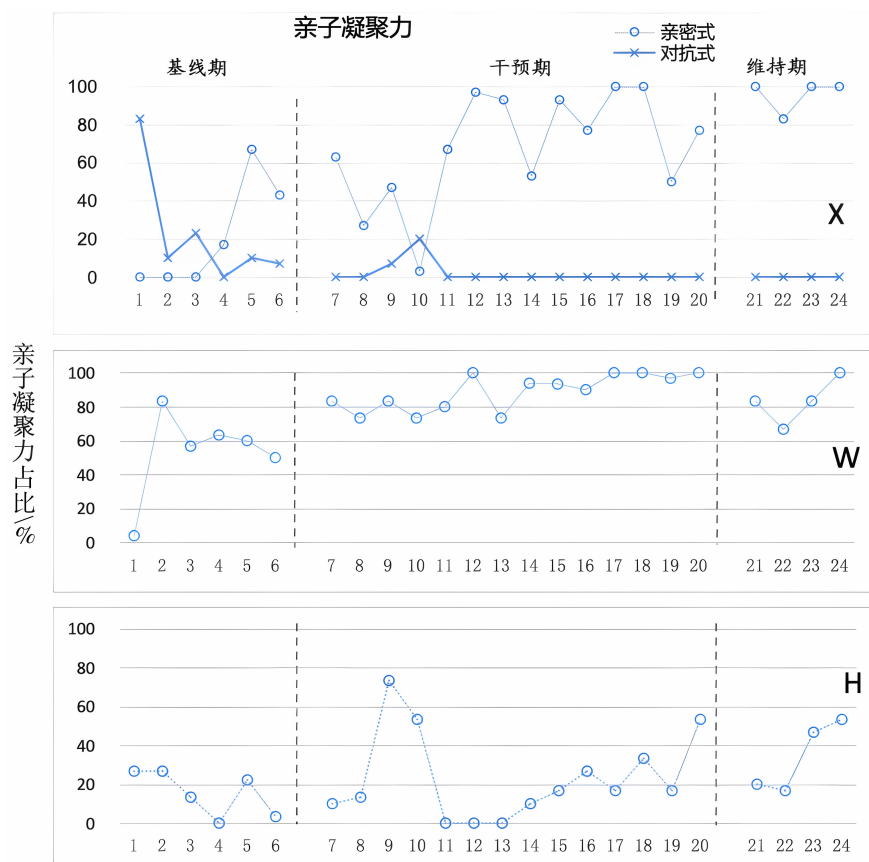


图 4 亲子凝聚力变化趋势

几乎不再出现对抗状态。观察发现,母亲会频繁地以充满爱意和赏识的目光注视孩子,并通过语言或动作积极地逗乐孩子,孩子也因此表现出积极的互动意愿,如饶有兴致地凝视母亲,或通过肢体动作发起互动。当孩子对母亲的逗乐行为产生积极反应时,母亲也会以更高涨的情绪状态投入互动,随着互动中正向反馈的增加,母子间的亲近意愿显著增强,从而形成更紧密的联结。

(五) 社会效度资料分析结果

1. 对干预模式的接受度高

干预结束后,X 父母和 W 父母、H 母接受了回访。根据回访时家长对干预形式及效果的评价可知,家长对干预的接受度很高。X 父亲表示:“这种(干预)形式非常好,线上会议很灵活,讲解很清晰,家

庭成员都可以参与进来。”W 父母回访时说道：“拍摄视频再去分析确实很有效，家长能得到旁观者的视角，线上视频会议的指导方式对我们帮助很大。”H 母也表示：“点评我们的操作，直接指出改哪里、怎么改，我觉得比单纯讲理论更好，对操作的帮助更大。”

此外，干预过程中研究者对家长参与行为的观察结果，也侧面验证了家长对于干预模式有很高的认同度。这几位家长始终按时参加线上会议和线下培训，从未迟到或缺席。X 父母在每次会议和培训之后均会反复回放录音，也经常向研究者分享日常亲子互动视频，遇到养育上的困惑也会主动咨询研究者。这些积极的参与行为正是家长对干预认同度高的具体表现。

2. 对干预效果的满意度高

就整体而言，家长对干预效果的满意度较高，家长观念、教养行为和儿童表现等均有积极转变，尤其是家长观念有了较大的转变。当被问到参与研究的收获时，X 母提到：“我们最大的收获是知道该如何对待宝宝，对孤独症的认识在逐渐提高。”W 母也认为“线上指导就像是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让我们知道要往哪儿走，能更好地对孩子进行居家教养。”H 母在回访中也提到：“参与研究的 2 个月对我的帮助很大，让我在方向上比以前更清晰，线上实操点评的感觉也很好，比学理论来得更直接。在看待刻板行为这一问题上，我们的心态也比以前更加平和，更能接受孩子的刻板行为，之前看到孩子出现这一行为就会很烦躁。”

四、讨论及建议

(一) 关于研究结果及其解释

1. 聚焦于“观念重构”的家长执行式干预课程能有效提高亲子互动质量

参与研究前，个案 X 母在亲子互动中会表现出对孩子自主意愿的明显忽视，以密集指令的互动为主，“强加意愿，牵着孩子的鼻子走”（X 母），互动时常陷入紧张、焦虑、无奈的状态，孩子在互动中的情感体验很消极，双方的情感联结与正向互动频率相对较低。W 母虽然采用的是“自然成长”型策略，但并未与 W 形成亲密式的亲子互动，W 与 W 父母常常处于平行无交互的状态，“以前泡奶粉或逗他的时候，孩子会故意躲开我（W 父）”。H 母既未表现出 X 母的强势介入型教育，也未采用 W 母的“自然成长”型策略，但 H 母子几乎也处于平行无交互的状态，“当孩子对于我发出的互动信号均无反应时，我不知道该如何做才好，很茫然。我只会用理性的方式去教他，不会也不知道该怎么陪他玩”（H 母）。在经过 2 个月的干预后，3 对母子的互动质量显著提升，母亲能以更积极的态度投入亲子互动，能用更夸张和高涨的情绪去逗乐孩子，更能敏锐识别并支持儿童的自主需求。这一变化主要得益于母亲互动观念的优化、情绪管理能力的提升、互动策略的改进等。因此，儿童的互动参与度显著提升，眼神对视行为持续增加，亲子情感联结更加紧密，且干预效果的稳定性在干预结束 1 个月后得到验证。

需要说明的是，基线期并非稳定状态，个别指标甚至表现出与干预期类似的变化趋势。其主要原因有：一是因遵循尽早干预原则，基线期并未以数据稳定为指标，因此个别指标的基线期数据变化趋势呈现出与干预期类似的变化或许只是巧合。二是基线期并非绝对的非干预期。在采集基线数据前 1 个月，X 父母、H 母均接受了研究组 1 次长时间的面对面咨询，在研究对象招募期间 3 个家庭均接受了为期 1 天的孤独症居家干预培训，并与研究者有若干次非正式的线上沟通。基于对家长焦虑情绪的充分理解，研究者并没有以研究项目未正式启动为由拒绝回应，相反，每次均耐心答疑。实际上，从为家庭提供咨询服务开始，研究者便对家庭实施了实质性的系统干预，并由此促成了家长在互动理念与策略上的渐进式转变。

2. 影响亲子互动质量的直接因素是母亲情绪

从因变量的变化趋势来看，3 对母子的互动情绪、互动行为与亲子凝聚力的变化趋势几乎一致，进一步分析个案 X 各因变量间的关系发现：当 X 母以消极情绪发布指令时，儿童更易表现出消极情绪反应和更少的眼神对视行为（如第 1、2、3、8、9、10 次数据所示）。干预后期，X 母的情绪稳定性显著提升，愉悦情感表露频率有所增加，虽然在每次互动中均存在间歇性高频教养指令，但孩子的消极情绪反应显著降低（如第 16、18 次数据所示）。由此说明，儿童消极情绪反应与母亲是否发布指令无显著关联，而

与母亲发布指令时的情绪密切相关。母亲在消极情绪表达时更倾向于采用心理控制,表现为亲子互动中的非同步互动行为增加。儿童的消极情绪反应未必对亲子互动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因其情绪反应与母亲行为无直接关联,更可能源于互动中的任务挫败感,正如个案H极偶尔出现的消极情绪反应,几乎都是因为“摔跤”或“洗澡水溅到眼睛”等。当孩子遇到挫折或表现出消极情绪反应时,母亲若能以积极情绪实施干预,依然可保持良好的亲子互动质量,并增强亲子关系韧性(如个案X的第17、18次数据)。

3. 促成母亲情绪积极转变的直接动因是母亲孤独症儿童观的建立

在与几个家庭接触之初,研究者即建议母亲们以积极的情绪状态投入互动,虽然她们努力调整,但表现出来的却是“强打精神、强装积极”。正如X母所说:“无法接受孩子确诊为孤独症这件事,甚至不敢念出‘孤独症’这3个字。孩子玩的东西对大人来说也很无聊,我们很难跟他玩下去。”H母也提到“一开始就是想着要怎么去教他(与人互动),并且是用理性的方法去教,不会也不知道该怎么陪他玩。”母亲在互动过程中难以保持愉悦的情绪状态,难以沉浸式体验互动本身的乐趣,因此导致陪伴行为呈现程序化和功利化特征。

随着干预的持续推进,家长对孤独症的认知态度发生了积极转变。母亲们逐渐能以更加积极的心态看待孩子的行为和情绪问题,同时能更平和地接受干预效果的起伏变化。如X母所说:“以前我根本看得不得孩子沉迷于‘旋转物品’,我根本接受不了这一行为。现在就还好,偶尔出现这种行为我也能接受,也大体知道当孩子表现出沉迷行为时,有哪些技巧可以转移(注意力)。”H母也提到:“现在更能接受他的刻板行为,觉得这也没什么,甚至在他出现刻板行为时会思考该怎么参与他的行为。我的情绪好了很多,更能包容他。”W母的变化也显而易见,“现在会通过更丰富的语言表达(如直接说‘你怎么那么可爱’)和肢体接触(如拥抱、抚摸)向孩子表达爱意,我感觉孩子也很喜欢这种亲昵的互动方式。”谈及她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W母自认为其核心是“看待孤独症的观念变了”。

当家长对儿童的认知发生积极转变后,基于赏识与尊重,活泼与逗乐的互动模式得以建立。随着干预的持续深入,母亲从最初的紧张压抑逐渐发展为更具松弛感的互动状态,互动中的自在感与愉悦感明显增强,展现出更具创造性的游戏力,能够以更开放、灵活的方式与儿童共同游戏。“以前下雨天出去就不会让他踩水,我现在给他买好雨鞋和雨衣,陪他一起踩水玩,虽然很幼稚,但的确蛮好玩的。”(H母)。母亲们互动状态得以转变的深层动力,既来自互动调整后所带来的正向反馈,更源于母亲们对孤独症儿童认知观念的重构,即从矫正视角的干预调整为赏识视角的对话。

4. 家庭支持系统通过影响母亲情绪进而影响干预效果

在参与研究的3个家庭中,个案X及个案W的家庭支持系统更为完善。具体而言,X生活在三代同堂的复合家庭中,其父母与外祖父母形成了较为稳固的育儿联盟——家庭成员对孩子的特殊状况有较为清晰的认知,在干预目标上也达成了基本共识。家庭人力资源较为充足,X母可以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集中精力投入对X的干预,同时保持着对家庭事务的决策主导权。

W父母在关于W的教育问题上,也表现出教育观念与行动的高度统一,且W哥哥在其父母影响下,对W的态度也有了积极改善。整体来说,W有着和谐的家庭氛围,且家庭成员在对他的干预实践上具有良好的分工协作。因此,对个案X和个案W家庭来说,当父母对孤独症儿童的认知观念发生转变后,父母沉浸式的居家干预实践便成为可能,进而促成亲子互动质量的持续改善。

与X和W完善的家庭支持系统相比,个案H的家庭生态存在明显的脆弱性。回访中,H母坦言,家庭内部意见不统一是干预之路上最大的困扰。即便H在1岁10个月时已被确诊为孤独症,但“爸爸到现在还坚持认为我(H母)是小题大做”,这使得母亲在干预中深感“孤军奋战”。此外,繁重的家务几乎完全落在H母的肩上,由于缺乏必要的支持与喘息时间,她难以放松地投入到与孩子的互动中。尽管她不断努力调整状态,但互动中那份因孤立无援而产生的疲惫感与紧绷感仍十分明显。

回访期间,H母子暂时住进了外婆家。H母描述了这一调整所带来的积极变化:“现在在我妈妈家(无需承担家务、H的舅妈也能给予支持),我的状态更好了些,没那么疲惫了,能更好地去逗乐孩子。”可见,当主要照料者能从繁重的养育压力中短暂“松绑”,她\他便能将更多的情感能量直接投向孩子。

由此可见,一个持久、可靠的家庭支持系统是高质量亲子互动的坚实基础。

(二) 关于孤独症儿童的早期干预

Mahoney 等指出,以家庭为中心的早期干预应支持家长作为特殊儿童的长期照料者,促使父母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获得对家庭生活的控制感。^① 亲子互动干预作为一种重要的家长教育形式,其目标不仅是传授具体的互动技巧,更应赋能家长,使其能够灵活应对日常互动中高度情境化与多变性的挑战。因此,必须打破传统的以干预者和儿童为中心的固有模式,转而与家长建立深度对话与密切协作的伙伴关系,以尊重和支持的方式激发其主体性,真正引领家长实现从“被动执行”到“主动成长”的转变。与之相应,干预者需深刻认识到家长教育的复杂性,必须具备对儿童实施直接干预的能力及用案例向家长提供清晰示范和具体反馈的能力。^② 此外,还应特别关注以下两个方面。

1. 干预目标应以积累儿童与人互动的积极体验为核心

同以往大量研究结论一致,本研究再次验证了亲子互动干预是一种高效的早期干预形式,即便短期干预,亦能在儿童发展与亲子关系等多方面产生积极效应。在本研究中,干预的核心原则始终是引导孤独症儿童家长理解:亲子互动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儿童积累与人交往的积极体验,从而构建他们与人互动的内在动机。因此,干预重点在于指导家长如何运用夸张的情绪、丰富的表情和充满活力的动作来吸引和逗乐儿童,而非直接训练诸如眼神对视等孤立技能。结果发现,当互动的趣味性得以提升,儿童在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愉悦体验,其对母亲及他人的关注度便会自然增加。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以功利化目标为导向的互动所取得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正如 H 母所反思的:“一开始就是想着要怎么去教他(如回应他人提问等社交技能),并且用理性的方法去教,他没反应,我就很烦躁。后面就去逗他,他开心我也开心。”当家长过度聚焦于某项孤立技能的灌输时,互动本身便沦为了工具,家长因此难以展现创造性的游戏力,情绪也十分紧绷,导致双方都无法享受互动过程。X 母的反馈也揭示了积极亲子关系的基础性作用:“随着他对我们的信任度和亲密度提高了,再去教他,他可以更好地理解。正如‘亲其师、信其道’。”

因此,在孤独症儿童的早期干预过程中,唯有以儿童获得与人互动的积极体验为中心,父母以赏识、尊重和活泼的姿态投入互动,高质量的亲子互动才成为可能。这种以积极体验的获得为核心的互动,是促成亲子关系与儿童社会性行为实现良性转变的关键机制。

2. 干预内容应基于个别化评估的动态调整

亲子互动具有高度的情境性与可变性,受互动目的、环境氛围、双方情绪和性格特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在对亲子互动视频的分析中发现,尽管存在共性特征,但不同亲子对之间乃至同一对亲子在不同时期呈现的互动状态均存在差异。

因此,在干预实施过程中,研究者需通过对互动视频的细致分析,描绘出每对亲子互动的完整图景,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持续、动态的评估,去实施具有针对性的干预。这与亲子互动治疗(Parent-child Interaction Therapy)等预设的高度结构化课程不同,本研究采用的干预模式强调内容的生成性与动态性。它并非套用固定脚本,而是通过实时评估来回应每对亲子的即时状态与个性化需求,从而更有效地适应互动情境流变,并充分激发家庭自身的能动性与创造力。

综上,在明确核心干预目标与原则的前提下,干预的具体内容有必要基于实时评估进行动态调适。如此,才能为家庭提供既系统规范又具有针对性的有效支持。

3. 干预应聚焦于家长观念重塑

Mahoney 等认为,干预不仅应关注影响儿童发展的互动行为,也应关注家长在亲子互动方面所持有的

① MAHONEY G, BELLA J M. An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s of family-centered early intervention on child and family outcomes [J]. Topics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1998, (2): 83-94.

② MAHONEY G, KAISER A, GIROLAMETTO L, et al. Parent education in early intervention: a call for a renewed focus [J]. Topics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1999, (3): 131-140.

观念与态度。^① 本研究发现,虽然具体互动技巧能在解决特定问题时收效迅速,但由于亲子互动本身具有高度的情境性与可变性,除非能帮助家长重构正确的教育观念,否则他们很难在复杂多变的日常情境中举一反三,导致干预的长期目标发生偏离。正如 Siller 等在综合分析了 8 项家长介入的研究后指出,很少有家长能够持续、准确地应用干预策略,干预强度往往难以维持。^② 赵楠等人进一步分析认为,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家长对治疗师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则在于家长虽能短期掌握干预技巧,却因经验、时间、动力、心理支持不足等因素,导致干预的稳定性不够,从而出现短期有效而长期效果不佳的现象。^③

针对这一困境,本研究提出了更深层的解释:干预策略难以取得稳定效果的根本原因,在于家长尚未完成从“问题矫正”的缺陷视角到“积极关系构建”的发展视角的范式转变。当家长真正内化了以积极互动和关系建立为核心的观念后,干预策略便不再是需要机械复制的固定程序,而是可根据情境灵活运用“生成性工具”。这意味着家长获得了在多变情境中自我生成解决方案并进行动态校正的能力。因此,干预效果的维持并非由外部支持强度决定,而首先取决于家长是否完成了观念层面的深刻转变。本研究对干预结果的分析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家长观念的转变是亲子互动得以持续改善的核心机制。正如 X 母所言:“只要理念理解透了,清楚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方法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此外,家长的内在观念会通过影响其社会心理状态,进而作为一种关键的中介机制,对互动行为产生决定性影响。X 母的另一段陈述揭示了这种影响:“有时午夜梦回,会觉得这日子没什么意思,如果带着这种情绪投入第二天的居家干预,效果一定大打折扣。”因此,推动早期干预取得长效的主要路径在于以塑造家长的积极观念为核心,并辅以充分的情感支持与文化尊重,从而使其能够以健康、稳定的心理状态投入到高质量的亲子互动中。

4. 干预需引领家长的反思性成长

亲子互动质量的持续优化,从根本上依赖于家长教育观念与互动心态的调整,而这一内在转变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除借助系统的理论引导与日常干预中的理念渗透外,干预者尤需着力培养家长的自我反思能力,使其能够清晰地洞察自身的观念与心理状态如何具体地影响着互动质量。家长唯有将反思意识转化为一种稳定的习惯与能力,才能进行及时的自我评估与动态调整,从而实现持续的自我校正与成长。这一过程凸显了家长教育的深层内涵:它不仅是传道受业的过程,也是家长反思和提升自我价值的过程。知识的学习不仅来源于专家的讲授,更源于过往的生活经验。^④

基于此,本研究在干预实施中特别设置了“亲子互动自评问卷”环节。正如 X 父所反馈的:“刚开始不理解为何每次拍完视频都要做自评问卷,慢慢就理解了,这种旁观者视角能让自己更客观地看待互动过程,更易发现自身问题,及时纠偏。”这一实践表明,通过结构化的反思工具引导家长对自身互动状态进行自我观察与评估,是培养其发现问题、自主思考能力,并最终激发其内在成长动力的有效途径。

五、研究启示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所开发的家长执行式干预课程展开实证研究。该课程以“重塑家长互动观念”而非“传授家长互动策略”为根本路径,以“积累儿童与人互动的积极体验”而非“提高儿童社交技能”为直接目标,最终目的在于激发儿童与人互动的内在动机。研究结果表明,通过线下理论引导与线上亲子互动指导相结合的方式,能够有效转变家长观念,促进家长以更积极的状态投入亲子互动,从而为儿童积累更多积极的互动体验,进而激发其内在互动的意愿。

① MAHONEY G, BELLA J M. An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s of family-centered early intervention on child and family outcomes [J]. Topics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1998, (2): 83-94.

② SILLER M, MORGAN L, TURNER B L, et al. Designing studies to evaluate parent-mediated interventions for toddler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J]. Journal of Early Intervention, 2013, (4): 355-377.

③ 赵楠,潘威. 自闭症儿童早期干预中家长介入的优势、困境及应对策略 [J]. 中国特殊教育, 2020, (10): 22-26+57.

④ 刘潇雨. 中国自闭症儿童家长教育服务模式探析:对现有模式的反思和再探索 [J]. 中国特殊教育, 2016, (1): 36-41.

与传统以改善孤独症儿童行为问题、社交障碍等外显症状为目标的家长执行式干预不同,本研究将干预重点聚焦于儿童互动过程中积极体验的积累,将儿童行为症状的改善与技能发展视为高质量互动的自然结果。在家长的视角逐步从“问题矫正”转向“积极发展”之后,他们在互动中便更容易呈现积极的情绪状态并运用创造性方法致力于营造愉悦的互动氛围。

在具体互动中,家长的观念影响其情绪状态,而情绪又发挥着关键的杠杆作用。当母亲能够以积极情绪投入互动时,其同步互动行为与互动趣味性显著增强,儿童也更愿意主动靠近,亲子之间的情感凝聚力随之提升,进而形成“互动越有趣,儿童越参与”的良性循环。这一发现与 Mahoney 所强调的“所有发展性干预所带来的儿童发展的变化,均源于母亲互动反应性的中介作用”^① 观点相一致,同时也支持了以往研究中“亲子互动中的情绪支持及凝聚力与孤独症儿童社会技能发展显著相关”的结论^②。

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进一步指出,在以家庭为中心的早期干预实践中,专业人员的角色应从传统的“策略传授者”转变为“观念引导者”,并需要具备反思性提问与直接示范的能力,以促进家长的认知转变。

总体而言,本研究为家庭中心的早期干预本土化实践提供了初步探索。未来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化家长培训课程的内容,深化相关理论构建,并为实践者提供具有操作性的指导手册。此外,本研究样本量有限,后续可通过“培训者培训”模式扩大干预范围,并开发更具针对性的评估工具,以验证该实践范式的广泛适用性与干预有效性。

From Strategy Transmission to Conceptual Re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Parent-Implemented Intervention for Autistic Children

ZUO Qiufang, PAN Yujing

(School of Special Education, Yuzh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China 330103)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ed a cross-subject multiple-baseline design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a parent-implemented intervention for three families with autistic children on the basis of conceptual reconstruction.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one-day offline conceptual training and seven-week online interactive video feedback guidance implementation, the focus of the intervention paradigm shifts from rectifying problem to positive development, for the aims of reconstructing the perspectives of autistic children for parents and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and giv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positive experience for children when they interact with others instead of skill training. Results indicated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mothers' positive emotions and synchronous behaviors, along with an increased frequency of child-initiated eye contact and enhanced parent-child cohesion. These improvements were maintained at the one-month follow-up.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focus of parent-implemented intervention effectively improves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quality with the shift from strategy transmission to parents' conceptual reconstruction. The accumulation of children's "positive experience with others" stimulates children's social intentions, offering the new local practical values paradigm for early intervention of the family-centered autism.

Key words: autistic children; positive experience; parent-implemented intervention;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责任编辑:杨谨瑜)

① MAHONEY G, KAISER A, GIROLAMETTO L, et al. Parent education in early intervention: a call for a renewed focus [J]. Topics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1999, (3): 131-140.

② HAVEN L E, MANANGAN N C, SPARROW K J, et al. The relation of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qualities to social skills in children with and without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J]. Autism, 2014, (3): 292-300.